

示威現場： 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現場調查方法

袁瑋熙*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

鄧鍵一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鄭 煒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

前言

2019年3月香港特區政府為因應台灣一起殺人案件而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以下簡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從而引發一連串的大型示威遊行與抗爭行動，其規模、頻密程度及衝突場面，均為前所未見。這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為起點，迅速演變為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爭取普選的全民運動，短時間內使特區政府陷入自回歸甚至開埠以來最嚴峻的政治危機。

台灣社會學第38期（2019年12月），頁163-174。DOI: 10.6676/TS.201912_(38).05

* 通訊地址：香港屯門青山公路嶺南段8號嶺南大學政治學系；

Email: samsonyuen@ln.edu.hk

為了了解這場俗稱「反修例運動」的基本面貌及發展走向，我們幾位來自不同學科的社會科學學者組成了一支研究團隊，從 6 月 9 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開始，連續在各個遊行示威場合進行現場問卷調查。但誰也沒有預料到月初的這場大遊行會發展成曠日持久的抗爭，更無法預測後來在不同抗爭場合會遇上什麼樣的狀況。起初，我們根據過往的研究經驗設計調查方法，但隨著示威的持續和場景的變化，團隊在積極應變的過程中逐漸探索出一套更有系統、更能涵蓋不同情況的調查方法，能儘可能客觀地呈現示威者的人口特徵、參與動機和意識形態，務求減輕瞬息萬變的示威現場所帶來的各種限制。

調查方法

研究團隊在反修例運動的示威現場進行了 25 次問卷調查，期間自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10 月 20 日，總共回收 16,063 份有效問卷，部分研究成果已發表（Lee, Tang, Yuen and Cheng 2019; Lee, Yuen, Tang and Cheng 2019）。基於資源調配問題以及事前對行動參與人數和重要性的評估，個別遊行如 7 月 7 日九龍遊行、7 月 13 日上水遊行、8 月 3 日旺角集會等因而未納入調查。

抽樣方式

示威現場無法以電話號碼作為抽樣框架（sampling frame），要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就必須以抗爭空間作為框架，並確保樣本在地理位置上平均分佈，這是香港學者在過往研究七一遊行、六四燭光晚會，以及雨傘運動時所遵從的原則（Chan and Lee 2008; Lee and Chan 2013; Lee and Chan 2018; Cheng and Chan 2017; Yuen 2018）。團隊的抽樣設計為：每次示威遊行前，團隊會先估計抗爭行動大概的範圍或路線，然後指示訪問員在一個特定範圍內，或在特定路線上，邀

請他們遇見的第 10 個人填寫問卷，如遭拒絕，則會邀請之後遇見的第 10 個人，如此類推。可是，在我們區分的三種示威類別中，由於參與者各有其不同的流動方式與空間分佈，而抗爭的形態也可能出現突如其來的變化（例如 7 月 1 日遊行演變成包圍立法會行動），因此抽樣方法須按照現實情況加以調整，其大要如下：

- （I）大型遊行：先把遊行路線劃分成數個區段，沿途設置臨時終點。訪問員被分派到各個區段，跟隨遊行人士前進，並在行進中進行問卷調查，直到臨時終點為止。
- （II）大型集會：先把集會空間劃分成數個區域，訪問員被分派到各個區域，繞圈步行，沿途進行問卷調查。
- （III）流動性集會：與（II）基本相同，但由於這類別示威的流動性較高，現場指導人員會按實際情況安置訪問員進行問卷調查。

每一次現場調查都會安排 2 至 3 名指導人員，並依預期參與人數安排 10 至 25 名訪問員。訪問員須使用通訊軟件 WhatsApp 回報其實時位置，以便指導人員掌握各人所在地，隨時作出調配，確保抽樣能夠充分反映示威現場的實況。訪問員須佩戴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所發出的證件，以資識別。

訪問方法

在八月之前的示威遊行現場調查，團隊分別使用了兩種問卷調查方法——網絡問卷和紙本問卷。受訪者可以用手機掃描訪問員提供的二維碼，然後在他的手機上填寫網絡問卷。受訪者若拒絕使用網絡問卷，訪問員會提供紙本問卷，讀出問題並記錄回應。紙本問卷的訪問一般需時 10 分鐘，拒絕訪問的人數亦會被記錄。

使用網絡問卷能快速且有效地收集更多樣本，但受訪者若不願使用手機，則仍需仰賴紙本問卷，以確保樣本能充分代表整體遊行人士的特性。但由於短時間內無法招募更多訪問員去收集更多的樣本，

因此，如何透過一個小型團隊去最大化樣本數，便成為團隊最大的挑戰。所幸網絡問卷軟件 Qualtrics 操作簡易，受訪者只需要掃描二維碼進入問卷，便可以自行回答題目，讓訪問員可以有限時間接觸最多受訪者。研究員也可以在 Qualtrics 介面實時得知已經完成問卷及正在回答問卷的人數，從而更有效編配人手。

然而，網絡問卷亦有其限制。第一，比較不熟悉現代科技的人，其拒訪的機率亦相對較高，即使有訪問員的協助，亦未必能完成問卷。第二，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下，示威者須承擔更高的風險（政治或法律後果），可能較不願意使用個人手機填寫網絡問卷。這兩個限制可能會系統性地把部分示威者排除在調查對象以外，導致反應誤差（response bias）。第三，網絡問卷需要穩定的網絡訊號，但在大型示威中，網絡訊號可能因使用人數眾多或被干擾而變得緩慢或不穩定。

由於網絡問卷有以上限制，即便是在手機使用如此普遍的今天，紙本問卷仍不可或缺。

傳單問卷

傳單問卷首次在 7 月 27 日元朗遊行中使用，這次遊行是為抗議 7 月 21 日晚上元朗西鐵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而舉行。與之前的示威不同，一方面，這次遊行未獲警方批准而形同非法集會；另一方面，網絡上傳言白衣人亦可能再次出現。礙於安全考量，團隊調整了調查方式，改為派發「傳單問卷」為主。方法是派四位有經驗的調查員在遊行路線上，派發印有連結網絡問卷二維碼的傳單。當天大約派發了 1800 張傳單，至隔天中午截止時，總共收集到 235 份有效回應（約 13% 回應率）。

經此一役，儘管團隊認為傳單問卷有明顯的缺失（例如抽樣程序不夠嚴謹、回應率不穩定等），但由於派發傳單的接觸面更廣，有可能減低調查員因挑選訪問對象而造成的選樣誤差，而被系統地排除的

示威者亦可能減少，因此，在 8 月 4 日的將軍澳遊行和西環集會，我們同時使用了網絡問卷、紙本問卷及傳單問卷。而這兩次集會的經驗顯示，加入傳單問卷的確能夠有效地增加樣本數；可是，我們也發現一個小問題，就是參與者有可能將傳單再傳到未參與者手上並上網回答問卷，對此，我們要求受訪者說出參與活動的確切時間和位置，並限定二十四小時內回覆，以資區別。

樣本加權

訪問員會在現場調查完成後兩日內，透過網絡系統記錄問卷數據。而傳單問卷則會在活動結束一兩天內截止收件後完成數據登錄。

表 1 為透過三種問卷方法所收集到的樣本數據。

以上三種問卷調查方法都有可能出現系統偏頗的情況。但整體上，我們假定年齡較大的受訪者使用網絡的程度比較低，網絡問卷（包括面對面邀請作答及派發傳單）所呈現的結構會傾向年輕受訪者，因此我們針對紙本樣本的人口特徵進行加權處理。

我們選取了 6 月 16 日維園一政總的 200 萬人遊行、8 月 4 日將軍澳遊行、西環集會、9 月 15 日港島（銅鑼灣、灣仔、中環）流動集會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2。8 月 4 日的遊行首次混合使用三種方法收集樣本。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嚴重警民衝突之後，9 月 15 日的示威氣氛已經比較緊張，此時收集的樣本正好與 8 月 4 日加以對照，以釐清混合方式的效果和局限。另外，表 2 也納入 8 月和 9 月進行的全港電話民調數據，以比較全香港與特定示威現場的人口特徵有無差異。根據表 2，我們有以下幾點發現值得討論：

（1）紙本問卷的比例跟示威現場的狀況有關連：6 月 16 日大型遊行的氣氛較為平和，大部分受訪者（69.7%）都願意以紙本問卷作答。但到了 8 月、9 月示威者的情緒已比較高漲，警民衝突隨時可能發生，便很少有人願意停下來回答紙本問卷。此時「紙本」和「網絡」的重要性較為接近，在這意義上，以紙本作為「母體」來加權處

表 1 反修例運動現場調查概覽

示威日期	示威地點	示威類別	樣本數目	網絡樣本 (面對面邀請)	網絡樣本 (傳單)	紙本樣本	回應率	誤差範圍 *
6 月 9 日	維園—政總	(I) 大型遊行	285	N/A	N/A	285	74.0%	5.8%
6 月 12 日	政總	(III) 流動性集會	175	85	N/A	90	N/A	7.4%
6 月 16 日	維園—政總	(I) 大型遊行	875	265	N/A	610	89.0%	3.3%
6 月 17 日	政總	(III) 流動性集會	717	598	N/A	119	91.5%	3.7%
6 月 21 日	政總、警察總部、稅務大樓一帶	(III) 流動性集會	316	184	N/A	132	87.8%	5.5%
6 月 26 日	愛丁堡廣場	(II) 大型集會	418	164	N/A	254	90.7%	4.8%
7 月 1 日	維園—政總	(I) 大型遊行	1169	686	N/A	483	83.1%	2.9%
7 月 14 日	沙田	(I) 大型遊行	546	254	N/A	292	87.8%	4.2%
7 月 21 日	維園—修頓球場	(I) 大型遊行	680	275	N/A	405	90.8%	3.8%
7 月 27 日	元朗	(I) 大型遊行	235	N/A	235	N/A	13.1%	6.4%
8 月 4 日	將軍澳	(I) 大型遊行	717	64	511	142	85.6%/17.0%	3.7%
8 月 4 日	西環	(II) 大型集會	555	106	338	111	92.7%/16.9%	4.2%
8 月 10 日	機場	(II) 大型集會	2309	N/A	2236	73	N/A	2.0%
8 月 11 日	深水埗	(I) 大型遊行	412	63	272	77	N/A	3.9%
8 月 13 日	機場	(II) 大型集會	485	N/A	485	N/A	N/A	4.5%
8 月 16 日	遮打花園	(II) 大型集會	632	N/A	632	N/A	15.8%	3.9%
8 月 18 日	維園	(II) 大型集會	806	73	586	147	82.8%/18.3%	3.5%
8 月 25 日	葵芳—荃灣	(I) 大型遊行	372	7	297	68	91.5%/9.3%	5.1%
8 月 31 日	中環、上環	(III) 流動性集會	527	N/A	527	N/A	13.2%	4.3%
9 月 8 日	遮打花園—美國駐港領事館	(I) 大型遊行	337	32	231	74	94.6%/14.4%	5.3%
9 月 15 日	銅鑼灣、灣仔、中環	(III) 流動性集會	911	209	524	178	83.8%/13.1%	3.3%
9 月 28 日	政府總部	(II) 大型集會	405	N/A	405	N/A	10.1%	4.9%
10 月 1 日	銅鑼灣、灣仔、中環及香港各區	(III) 流動性集會	640	N/A	640	N/A	13.3%	3.9%
10 月 14 日	遮打花園	(II) 大型集會	662	N/A	662	N/A	16.6%	3.8%
10 月 20 日	尖沙咀	(III) 流動性集會	921	N/A	921	N/A	19.2%	3.2%

註：如果回應率有兩組數字，前者為紙本樣本及面對面邀請作答的網絡樣本，後者為傳單的回應率。

* 誤差範圍：在 5%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內，以樣本數目代表香港人口數目下，數值可能出現的誤差。當然，這調查只是以示威者為調查對象，並非香港整體人口的意見調查，但考慮到難以得知遊行及示威人數作為真實人口的準確數字，我們計算誤差範圍的時候，以香港整體人口為母體，以得出比較保守的誤差範圍。

理就顯得重要。

(2) 三種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性別、教育程度兩方面都沒有顯著差異。

(3) 6月16日和8月4日受訪者的年齡，以「紙本」受訪者較年長，「網絡」和「傳單」受訪者較年輕，達到顯著水準。這與前述較年長的受訪者未必習慣用手機填問卷的傾向之假設相符，因此對「紙本」樣本的人口特徵作加權處理就具有合理性。但是，9月15日同樣以三種問卷顯示的年齡分布，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結果，「網絡」和「傳單」的受訪者較「紙本」受訪者年輕，達到顯著水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隨著示威氣氛愈趨緊張，年輕受訪者對使用手機填問卷愈有戒心，因此反而傾向選擇紙本。由於此次顯示年齡分布情況並不符合加權處理背後的假設，我們並沒有對紙本的人口特徵作加權處理。

(4) 為了進一步檢視對「紙本」受訪者的人口特徵作加權處理的可靠性，我們以8月、9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全港人口調查的結果作對照。兩次的全港調查顯示參與過反修例遊行集會的香港市民比例都在三成半到四成之間（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2019）。對比之下，我們發現，在性別方面，除了8月4日參與示威的男性略多之外，另外兩次無論是何種調查方式，男性的比例都跟全港人口調查相若。

(5) 值得注意的是，兩次全港調查均顯示曾經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受訪者，整體的年齡比現場調查的受訪者明顯較年長，教育水平也相對較低。也就是說，從全港人口來看，年齡和教育程度是負相關的。兩次全港調查顯示分別有 29.6%、34.8% 曾經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受訪者是 50 歲或以上。而在三次示威現場，50 歲或以上的分別為 18.2%、14.3%、13.9%。如果 6 月 9 日、8 月 4 日兩次只計算「紙本」，50 歲或以上受訪者分別佔 23.5%、24.0%。這印證了針對「紙本」樣本作加權處理的基礎是相對可取的做法。全港調查顯示示威者仍然比較年長，可能的原因有二：（一）在示威現場，不習慣做問卷

調查的年長人士比較容易拒訪；（二）由於全港電話調查將曾經參與任何一場示威的受訪者都計算為參與示威人士，而 8 月以後示威現場的氣氛比較緊張，也比較以年輕人為主導，那麼如果把個別示威現場的示威者與全港曾經參與示威的人口作比較，後者自然比較多年長人士。

表 2 的數據大體上支持了以「紙本」人口特徵為加權基礎的背後假設。然而這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例如 9 月以後不少示威者出於風險考量而選擇以紙本作答，就使得紙本的加權基礎失效。

誤差與限制

三種調查方法的「混合」使用有效增加樣本的代表性，但亦面臨一些方法上的問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研究的選樣誤差（selection bias）問題。選樣誤差是訪問員在有意或無意下，系統性地排除個別特徵人士參與調查的結果。例如，年輕的訪問員可能較傾向邀請年輕示威者進行訪問，而訪問員亦較傾向與看似友善的人交流。

Stefaan Walgrave 和 Joris Verhulst（2011）提出一個有效減輕選樣誤差的方法，是由現場指導人員「定點」挑選受訪者。這個做法的好處是能減少訪問員按主觀的個人偏好抽樣，確保問卷調查嚴格按照抽樣方法進行，但在近期的香港示威中卻顯得不切實際。首先，這個做法需要大量的指導人員，但在有限時間內團隊無法組織大量人手。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大型示威往往有數以萬計人士參與，在人頭湧湧、插針不入的街道上，「定點」挑選的做法基本上難以實現。

最後，團隊決定交由訪問員進行選樣。為了確保訪問員跟隨抽樣原則，每次現場調查前都必須進行訪員訓練，講述研究問題及抽樣過程。我們要求每位訪問員每小時最多只能收集 10 至 15 個樣本，以確保樣本是來自散佈在示威現場不同位置的受訪者，而不是集中在某些團體（因為同儕之間通常有類似的想法）或人群。

另一個是樣本的排除性問題。一般來說，大型遊行和集會的調

表 2 比較全港調查、現場調查、各種現場調查方法的人口特徵之差異

	全港調查 (8月)	全港調查 (9月)	現場調查 (6月16日)				現場調查 (8月4日)				現場調查 (9月15日)			
			所有 樣本	紙本	網絡	所有 樣本	紙本	網絡	傳單	所有 樣本	紙本	網絡	傳單	
曾經參與任何所修 示例威 (%)	36.4	42.2												
不同問卷來源 (%)				69.7	30.3		19.8	18.7	61.5		19.5	22.9	57.5	
性別：男性 (%)	50.1	48.4	50.5	49.5	52.8	58.0	61.8	56.7	57.2	51.0	53.4	50.2	50.6	
年齡層 (%)				***	***		***	***	***		***	***	***	
19 歲或以下	10.5	6.7	15.6	12.8	22.3	7.8	5.6	7.6	8.6	10.1	12.9	8.6	9.7	
20 至 29 歲	27.2	21.3	34.6	30.2	44.5	49.2	45.8	52.1	49.3	46.4	59.0	46.8	41.8	
30 至 39 歲	18.7	20.5	21.9	23.4	18.5	18.3	14.4	20.6	18.7	20.1	20.2	15.3	22.0	
40 至 49 歲	14.1	16.7	9.6	10.1	8.3	10.4	10.4	10.5	10.3	9.7	6.1	9.6	10.8	
50 至 59 歲	15.0	18.6	10.8	13.5	4.9	10.0	14.0	8.0	9.5	8.5	1.7	6.7	11.4	
60 歲或以上	14.6	16.2	7.4	10.0	1.5	4.3	10.0	1.3	3.6	5.4	0.0	12.9	4.2	
				***	***		***	***	***		***	***	***	
年齡層平均值 *	3.4	3.7	2.9	3.1	2.3	2.8	3.1	2.6	2.7	2.7	2.2	3.0	2.9	
教育程度														
大專或以上學歷 (%)	49.7	49.3	68.3	67.7	70.1	77.4	69.7	76.8	80.1	83.5	80.9	81.0	85.5	

* 年齡層平均值的數值，來自把受訪者的年齡層分為 6 組，由 1=19 歲或以下，至 6=60 歲或以上。年齡層平均值即是該次調查受訪者年齡層的平均數值。

查對象往往限於參與和平遊行和集會的人士，而持續進行後續行動的較「勇武」的示威者，則未必能夠充分反映他們的參與。首先，為了保障訪問員的安全，我們要訪問員儘可能避免在最前線進行調查。例如 6 月 21 日只要求訪問員在警察總部外面進行訪問，因而未必能夠訪問到站在最接近警總大門的示威者。又如 7 月 1 日只在日間進行訪問，而晚上衝撞立法會的參與者就未能接觸到。其次，激進示威者往往較為緊張，亦有較多保護裝備，他們比較可能拒訪。因此，整體而言，我們相信激進示威者在調查樣本中所佔比例，應稍低於他們實際所佔比例。

最後不得不提受訪者對團隊的信任問題。在香港，以往類似的示威現場調查，一般都有超出國際水平的回應率（例如 2014 年雨傘運動的現場調查，就曾出現過 90% 以上的回應率），當中原因相信與香港缺乏民主制度有關，示威群眾希望透過民調反映其訴求，因而比較「敢言」。但是，在反修例運動中，尤其是後期的遊行集會，警方大多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而出現在示威現場將被視作「違法行為」，因此即使參與集會，亦傾向拒訪，有的甚至懷疑團隊人員的身份，害怕留下資料會被秋後算賬。例如 6 月 17 日包圍特首辦的集會便有示威者不明所以，在 Telegram 上呼籲不要接受調查。雖然後來有人為團隊澄清，但亦難以完全消除示威者的疑慮。為了讓受訪者更信任團隊，我們後來在印有二維碼的傳單上，臚列了大量參考資料，包括團隊成員刊在報章上的文章，也加入了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的聯絡方法，供有疑慮的市民查詢。

結語

近十數年來，世界各地頻密地爆發大型的示威遊行，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 2010 年代初的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運動、2013 年烏克蘭的廣場革命、2014 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這些抗爭雖然源於不同的深層矛盾，但其形態有著不少共通點：突如其來、規模龐大、去中

心化、依賴社交媒體等。這些形態同時為學者帶來不少新的挑戰，令傳統社會科學的研究工具難以發揮效用。

2019 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有著類似的特質，正如一些外國媒體曾把香港是次運動稱為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遊行集會的形態也的確流動多變，作為研究者，我們的調查方法，在盡可能滿足傳統方法學上的要求的同時，也要不停作出適應和調整。

橫跨數月的抗爭行動，一方面為香港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另一方面意外地為學者提供足夠的時間，取得寶貴的數據，去呈現反修例運動的面貌和演變。團隊期望以上從二十多次的現場調查中整理出來的田野觀察，能為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供作參考，探索更為完善和規範的研究方法，回應屬於這個時代的社會運動。

參考文獻

-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有關「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意見調查》（第二、三輪），2019 年 8-9 月。
- Chan, Joseph M. and Francis L. F. Lee, eds. 2008.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Cheng, Edmund W. and Wai-yin Chan. 2017. “Explaining Spontaneous Occupation: Antecedents, Contingencies and Spa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2): 222-239.
- Lee, Francis L. F. and Joseph M. Chan. 2013.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iananmen in Hong Kong: How Young Rally Participant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4 Ju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4): 966-983.
- . 2018. *Media and Protest Logic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Francis L. F., Gary Tang, Samson Yuen, and Edmund W. Cheng. 2019. “Onsite Survey Findings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Surve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gust 2019. (http://www.com.cuhk.edu.hk/ccpos/en/pdf/ENG_antielab%20survey%20public%20report%20vf.pdf)

- Lee, Francis L. F., Samson Yuen, Gary Tang and Edmund W. Cheng. 2019. "Hong Kong's Summer of Uprising: From Anti-Extradition to Anti-Authoritarian Protests." *China Review* 19(4): 1-32.
- Walgrave, Stefaan and Joris Verhulst. 2011. "Selection and Response Bias in Protest Survey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6(2): 203-222.
- Yuen, Samson. 2018. "Contesting Middle-class Civility: Place-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ong Kong's Occupy Mongkok."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4): 393-407.